不平等厌恶偏好与村民相对贫困

黄艳敏，李春晓

（天津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

摘　要：引入前景理论关于福利的解构思想，构建主观福利视角的相对贫困考察模式。首次将社会偏好理论植入相对贫困领域，以不平等厌恶偏好为切入点构建内生化减贫模式。采用 CGSS2017 数据，测算贫困发生率以及贫困缺口指数，识别中国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运用 Logit 分析相对贫困广度，发现：不平等厌恶偏好具有诱发相对精神贫困的直接效应；且与收入、教育和健康交互作用于相对贫困广度，展现出调节效应。采用 OLS 分析相对贫困深度揭示：不平等厌恶偏好正向贡献偏离相对贫困线的贫困缺口指数；通过收入、教育和健康等途径调节相对贫困缺口倾向。

关键词：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主观福利；不平等厌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22)01－0054－13

一、问题提出

（一）消减相对贫困奔向共同富裕，贫困考察依托福利状态

平民百姓都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曾经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社会愿景。在习总书记提出“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引领下，党带领人民勠力同心实现了这一伟大梦想，中国从此告别了绝对贫困。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还不平衡，消减相对贫困成为奔向共同富裕社会的必经之路。Gallbraith 认为个体贫困与否不仅取决于自身收入状况，还与他人收入水平有关，贫困是涉及与他人比较的相对概念[1]。Fuchs 则正式提出相对贫困的概念，当个体生活状况比社会平均水平低到一定程度时，即为相对贫困[2]。此后，收入维度相对贫困考察为揭开贫困之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4]。诚然，收入微薄只是相对贫困的其中一个表现维度，多维贫困考察是反贫实践的重要导向[5]。虑及福利欠缺乃是贫困状态的真实反映[6]，从多维福利视角考察相对贫困将是对福利创造能力相对偏弱的农村居民展开贫困溯源的理性选择。

（二）疏离主观福祉充实的精神世界，疏解主观福利之困势在必行

依据前景理论，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一样都是牵制人们生活质量的广义福利建构的重要构成[7]，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是主观福利重要表征[8]764。然而，既往贫困考察对于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的关注度明显不对称。由于客观福利是保障生活质量的物质基础，物质福利差距造成的客观福利相对贫困易显化且易被察觉，故过往贫困研究大多聚焦于客观福利欠缺状况的考察，为减缓相对物质贫困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当前，在农村社会贫富分化日渐显现的背景下，村民幸福感或生活满足感缺失造成的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态，因为隐蔽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精神空虚甚至精神堕落现象并不鲜见。受此社会现实触动，本研究突破了以往聚焦考察客观福利相对贫困的常规，构建主观福利视角的相对贫困考察模式，为确立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再赴减贫征程的奋斗方向

收稿日期：2021－09－10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22.01.0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74114)

作者简介：黄艳敏(1974—)，女，辽宁盘锦人，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配。E-mail：huangneu@126.com

提供参考。过往研究业已显露出把主观福利纳入贫困考察范畴的痕迹。Alkire 就曾设想把主观因素纳入相对贫困考察范畴[9]。王小林等提出贫困与主观福利关联，并测算了老年人群主观福利的贫困发生率[10]22。Asadullah 和 Chaudhury 也曾探究过主观福利与农村相对贫困状况的关联[11]。这些研究偏离客观福利相对贫困考察的主流，另辟蹊径地开启了贫困考察的主观福利视角，创造性地拓展了相对贫困溯源的范畴。但不可否认的是，既有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研究尚缺少对于主观福祉匮乏的内在诱因揭示以及内生脱贫路径的挖掘。虑及相对贫困是从社会分配不平等演化而来的，个体由分配不平等现实衍生的信念偏好，很有可能牵制其行为抉择，若以农村居民对分配不平等的偏好为切入点，揭示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形成机制，寻求疏解相对精神贫困之道，或将为提升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筑牢基础。

（三）不平等厌恶偏好掣肘竞争意愿，或将破除授人以鱼的减贫定式

破除安贫乐道定式，解决脱贫的内生动力是农户减贫关键[12]45。因此，寻求贫困人口形成脱贫动机的内化途径成为翻越相对贫困藩篱的前提，也构成本研究的核心任务。当人们处于不平等格局启动价值判断时，否定分配差距的不平等厌恶偏好（inequality aversion）易于形成[13]821。不仅劣势阶层因为拥有希望摆脱不利地位的利己诉求而抱有落后厌恶偏好，即便是财富分配优势者也怀有厌恶贫富差距的公平偏好[14]。不平等厌恶偏好在社会分配不平等人群中的广泛存在性，为把不平等厌恶偏好引入相对贫困领域奠定了理论可行性。Bartling 等提出不平等厌恶偏好抑制贡献自我福利的竞争行为倾向[15]93。Balafoutas 等认为个体对于不平等格局的落后厌恶偏好显著制约竞争行为意愿[16]132。不平等厌恶偏好与创造福利的竞争行为关联关系，进一步显示了不平等厌恶偏好牵制相对贫困人口脱贫动机的可能性。虑及不平等厌恶偏好和相对贫困都从不平等格局衍生的同源性，且中国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偏好传统，不平等厌恶偏好很有可能激发人们试图消除不平等的竞争行为动机，继而牵制竞争行为结果，即在不平等格局下的相对贫困与否。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不平等厌恶偏好作为相对贫困治理发轫域的研究假设，力求揭示不平等厌恶偏好对于相对贫困的驱动机制，或将行为经济学“偏好－行为－结果”框架丰富为“不平等厌恶偏好－脱贫行为－相对贫困结果”的相对精神贫困框架，破除既往倚重外部帮扶的授人以鱼式的减贫模式，形成自救式的脱贫模式。

（四）当前工作有别于过往研究的边界

本研究在相对贫困考察角度和内生脱贫动机等方面扩展了相对贫困研究：第一，在过往研究多数聚焦考察客观福利相对贫困基础上，本研究为相对贫困溯源确立了主观福利视域的多维相对贫困考察模式，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大样本数据衡量村民主观福利相对状况，为向前追溯消减相对精神贫困的发轫域夯实了基础；第二，在既往相对贫困瞄准贫困群体的外在禀赋特征基础上，本研究以内在的信念偏好为切入点，提出不平等厌恶偏好作为相对贫困治理的发轫域，扩展性构建了从不平等厌恶偏好到福利创造的竞争行为再到相对贫困结果的行为经济学框架，为破解扶贫首要解决贫困群体观念问题的既有难题提供具体靶向；第三，在既往减贫研究普遍关注贫困广度基础上，加入了相对贫困深度的考量，构建起横向贫困广度与纵向贫困深度交错配合的相对贫困考察模式，与之对应地采取 Logit 和 OLS 并用的层级回归分析模式，为揭示相对精神贫困状况及其内生脱贫动力提供了实证分析范式。当下研究从主观福利视角建立的相对贫困归因分析模式，为疏解相对精神贫困提供了自我拯救路径。

二、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在乡土生活与城镇化交融的农村社会背景下，农村居民对幸福的感知力和对生活状况的满足感是其主观福利充实抑或匮乏的状态反馈，直接牵制其生活质量。不仅物质贫困群体因为物质生

活局限而存在精神福祉匮乏的可能,即便是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也可能因为缺少从奋斗中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而产生精神生活空虚的富毛病。如同客观福利分化事实存在一样,由于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的心理体验因人而异,主观福利分化也在所难免。因此,探究主观福利分化情况下相对精神贫困的形成规律,将为补齐相对贫困群体主观福利短板夯实基础。

(一)研究框架

在贫富分化不可回避的现实背景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分配偏好很有可能触发乡民不满于安贫乐道或小富即安的生活状态,继而衍生不平等厌恶偏好。当个体抱有否定不平等的负性信念越是突显时,越是可能阻滞固有途径的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等主观福利的形成,更可能与精神福祉缺失的相对贫困挂钩,预示不平等厌恶偏好引致相对精神贫困的直接效应。依据前景理论,客观福利是构建主观福利的物质基础,加之不平等厌恶偏好与相对贫困都依托不平等格局的同源性,不平等厌恶偏好很有可能裹挟在客观福利创造过程中,交互作用于主观福利相对贫困演进过程而展现调节效应。并且,不同的人对幸福的感知力以及对生活状态的满足感可能迥然不同,可能波及主观福利层面的相对贫困状况呈现群分效应。基于此,构建不平等厌恶偏好牵制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的理论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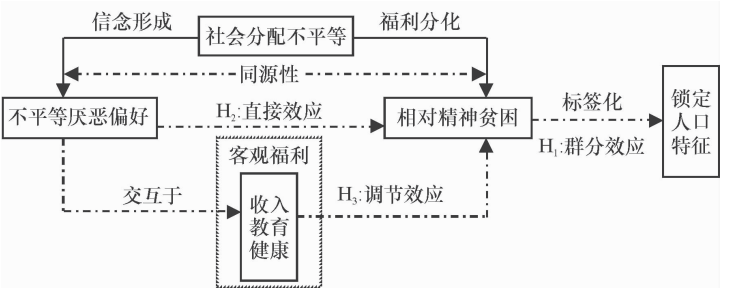


图1 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研究框架图

(二)研究假设

在中国上下勠力同心提振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社会背景下,消减农村社会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倾向,是以提升百姓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相对贫困治理应有之义。依据前景理论,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是主观福利的重要构成[8]764,通过观察个体对幸福的感知度和对生活状况的满足感评估主观福利水平[17],本研究据此确定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作为相对精神贫困的考察维度。当乡土生活不断受到城镇化和信息化等外部冲击时,乡民对于幸福的感知和对生活状况满足与否,既是人人都有的普遍心理体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生活认知,显现出主观福利分布的个体异化倾向。除了老年群体主观福利与相对贫困挂钩[10]27,无论因为物质生活贫乏而限制精神福祉创造能力的"穷毛病",抑或物质生活先富起来但精神福祉没有跟上的"富毛病",这些主观福利缺失引致的相对贫困风险是否存在人口特征上的群间异质性,仍是待解命题,就此提出:

H_1: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存在群分效应

H_{11}: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存在对人口特征的依赖效应

H_{12}:不平等厌恶偏好群间的相对精神贫困广度和深度都存在差异性

经济学从泛化的社会分配不平等中凝练出"赶上琼斯"现象,折射了不平等厌恶偏好与竞争动机的关联性。"赶上琼斯"是个体对竞争结果的预期,而追赶"琼斯"的竞争动机很可能源于内在不平等厌恶信念的驱使。只有当个体介意并试图摆脱落后于他人的不利境遇时,才有可能采取追赶行为并可能出现"赶上琼斯"的竞争结果。而此时,不平等厌恶偏好随着否定分配差距的信念出现而形成。相反,如若不平等厌恶偏好并未出现在分配信念中,安贫乐道或小富即安的信念很难驱动个体产生追赶他人的竞争动机。基于此,不平等厌恶偏好与否定福利现状的竞争动机存在关联迹象。然而,当不平等厌恶偏好驱使"赶上琼斯"的期待形成后,如果"赶上琼斯"的期待无法实现,很可能出现想得而未得的惆怅,掣肘人们固有幸福感和对已有获得的满足感。因此,不平等厌恶

偏好出现在分配信念格局将可能阻滞主观福利心理进程的积极发展，增加主观福利相对贫困风险，呈现出不平等厌恶偏好同向驱动相对精神贫困风险的直接效应，就此提出第二组研究假设：

H_2：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受制于不平等厌恶偏好

H_{21}：不平等厌恶偏好正向激发相对贫困发生可能性

H_{22}：不平等厌恶偏好同向驱动相对贫困持续缺口伸缩

贫困户摆脱相对贫困的努力方向，既涉及物质生活上的客观福利改善，也依赖精神生活上的主观福利提升，两者很难截然分开而独立存在。因此，消减主观福利相对贫困过程需要顾及客观福利在其间的作用。虑及不平等厌恶偏好与相对贫困都是从不平等格局演化而来的同源性，不平等厌恶偏好很可能裹挟在创造客观福利摆脱相对贫困的奋斗过程中。鉴于收入、教育和健康等是与物质生活质量紧密相关的客观福利维度[8]763，当不平等厌恶偏好出现在分配信念格局时，落后厌恶偏好内在驱使相对贫困者产生力求摆脱落后于他人的竞争动机，激发其投入更多努力获得收入、争取教育机会和维护健康。由此可见，不平等厌恶偏好很有可能通过收入、教育和健康等路径与客观福利演化过程交织在一起，对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态偏离客观福利既定驱动轨迹起到调节作用，就此提出不平等厌恶偏好作为客观福利驱动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形成过程的调节因子的研究假设：

H_3：不平等厌恶偏好对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存在调节效应

H_{31}：不平等厌恶偏好与客观福利交互作用而间接调节相对贫困广度

H_{32}：不平等厌恶偏好通过客观福利途径对于相对精神贫困持续深度存在调节效应

三、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线的建立与现实考察

与农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形成反差的是，精神空虚甚至精神堕落等主观福利缺失现象并不鲜见，厘清相对精神贫困状况可为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再赴减贫征程明确奋斗的方向。本研究跳出相对贫困聚焦考察客观福利的既有模式，从主观福利视角测算主观福利分化形成的相对贫困状况。使用 2020 年公开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衡量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福利值，测算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的基准线，匡算相对贫困发生率，计算贫困群体主观福利偏离相对贫困基准的相对贫困缺口指数，为确定减贫的任务清单提供依据。

（一）主观福利相对贫困测度基准的建立

鉴于幸福感匮乏和生活满足感缺失是个体主观福利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现实表现[17]，借鉴 Alkire 和 Foster 关于多维贫困考察的建构思想[18]，构建囊括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的主观福利指标。虑及熵值法能够根据不同维度指标对于总体建构的信息贡献进行赋权，缩小主观经验估计偏差，故采用熵值法构建主观福利综合指标。当被调查者 i 在维度 j 上的信念为（g_{ij}），则主观福利水平为 $SWi[f(g_{ij})]$。g_{ij}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

$$g'_{ij}=\frac{g_{ij}-min\{g_{1j},\cdots,g_{nj}\}}{max\{g_{1j},\cdots,g_{nj}\}-min\{g_{1j},\cdots,g_{nj}\}}$$

在维度 j 上的信念权重为：$p_{ij}=\dfrac{g'_{ij}}{\int_{i=1}^{n}g'_{ij}}$

被调查者 i 的主观福利熵值为，$SW_i=-c\int_{j=1}^{n}p_{ij}ln(p_{ij})$，$SW_i\geqslant 0$，$c=1/ln(n)$

基于主观福利的测算结构，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样本，建立主观福利序列 $SWS=\{SWi\}$。从中确定福利序列 SWS 的中位数为 $M(SWS)$。根据 Fuchs 认为当个体生活状况比社会一般生活水平低到一定程度即为相对贫困的思想[2]88，我们采用被考察群体在精神生活中的主观福利序列中

位数的一定比例确定相对贫困基准线 $l_{SW-RP}=K*M(SWS)$,关于 K 的选取借鉴客观福利相对贫困基准的选取方法。张莎莎和郑循刚主张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设定相对物质贫困线[12]48,也有主张以其50%为相对贫困标准线[19]。虑及当期研究对主观福利视角下相对贫困考察范畴的多维性,设定低限和高限双重相对贫困标准,可增加相对贫困状况考察的弹性。因此,确定40%和50%宽严相济的相对贫困双标准,以期对照反映在不同贫困线下的贫困发生状况,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富有弹性的任务边界。根据个体 i 的主观福利状况 SW_i 对照贫困基准线 l_{SW-RP},从中识别主观福利缺失的相对贫困人口。本研究设计横向的贫困发生率配合纵向的贫困缺口指数的相对精神贫困立体考察模式。采用贫困发生率反映主观福利相对欠缺的贫困人口在考察人群中的分布广度。贫困发生率 P_{SW-RP} 为参照 l_{SW-RP} 瞄准的相对贫困人数占比,即 $P_{SW-RP}=1/N*\sum I(SW_i<l_{SW-RP})$,当 $SW_i<l_{SW-RP}$,$I=1$。此外,由于主观福祉缺失程度存在个体差异,同样陷于相对贫困线之下而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但偏离相对贫困线的缺口不尽相同,表明相对贫困深度的差异性,故采用贫困缺口指数衡量相对贫困群体的贫困深度。贫困缺口指数 G_{SW-RP} 对标 l_{SW-RP} 厘定,当 $SW_i<l_{SW-RP}$,被观察者 i 的贫困缺口即为 $1-SW_i/l_{SW-RP}$,综合考察人群 N 中贫困缺口,形成相对贫困缺口指数 $G_{SW-RP}=1/N*\sum(1-SW_i/l_{SW-RP})*I(SW_i<l_{SW-RP})$,当 $SW_i<l_{SW-RP}$,I=1。当 $SW_i\geqslant l_{SW-RP}$,I=0。贫困缺口指数反映了相对贫困群体实际福利 SW_i 距离 l_{SW-RP} 的落差,贫困缺口越大说明沦为相对贫困群体的主观福利欠缺状况越令人堪忧。

(二)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的现实考量

1. 相对精神贫困的存在性及其现实表现

运用 P_{SW-RP} 和 G_{SW-RP} 考察中国居民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如表1所示),采用40%的相对贫困基准线,全国样本居民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发生率为2.79%,贫困缺口指数达到0.0125,为汪三贵和孙俊娜以客观福利相对贫困基准线测定的全国相对贫困状况补充了主观福利维度的相对贫困识别证据[20]。在本研究考察的3871人中,有108人处于幸福感驽钝和生活满足感亏欠的精神福祉贫困状态。以此贫困发生率匡算,中国约有3906万人处于精神福祉相对贫困状态,这一庞大数字表明主观福利感知钝化并不只是个别现象,这与物质生活的长足进步似乎形成了悖论。究其原因,不平等格局中领先者树立的标杆强化了追随者相对落后的信念,挤占了心理账户本该分配用于从日常点滴获得和细微改进中体验幸福感和满足感的份额,主观福利演进过程受阻不可避免。加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分配偏好干预,不能"赶上琼斯"的消极体验介入,抑制本该有的主观福利体验形成。因此,给予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群体应有的关注,疏解其相对精神贫困压力,庇佑其精神家园,可为民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等主观福利的持续提升夯实基础。

表1 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

		贫困发生率	贫困规模	贫困缺口指数	贫困缺口
宽松标准	全国(3871)	2.79%	108	0.0125	48.40
$K=40\%$	农村(2656)	3.09%	82	0.0148	39.34
	城镇(1215)	2.14%	26	0.0074	9.05
	老年(1332)	2.40%	32	0.0102	13.55
	非老年(2539)	2.99%	76	0.0138	34.96
严苛标准	全国(3871)	6.43%	249	0.0216	83.65
$K=50\%$	农村(2656)	7.19%	191	0.0250	66.39
	城镇(1215)	4.77%	58	0.0143	17.34
	老年(1332)	5.78%	77	0.0184	24.49
	非老年(2539)	6.77%	172	0.0233	59.25

随着百姓对美好生活期待的提升，相对贫困线可随之向上调整。在 50% 相对贫困线下，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发生率增加到 6.43%，有效样本中的相对贫困人口增加到 249 人。P_{SW-RP}在相对贫困基准线 40% 和 50% 下的弹性测算模式，从当下的 3871 个样本量推广到全国约 14 亿的庞大人口基数，将产生约 5096 万人口在相对贫困线临近区域流入或挤出，反映贫困治理工作任务边界的强大伸缩性。诚然，无论这部分人是否落入相对贫困线以下，均已构成相对贫困敏感人群，这是中国社会构建橄榄型阶层结构进程中需要关注的群体。相对贫困敏感人群的大规模存在，表明相对贫困治理任重而道远。鉴于全国层面的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考察结果不容乐观，虑及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除，现以城镇社会主观福利状况为参照，用以明确农村社会相对精神贫困形势。农村社会的相对精神贫困发生率（3.09%；7.19%）①高于城镇（2.14%；4.77%），且村民在相对贫困持续深度上的忧虑（0.0148；0.0250）也甚于城镇群体（0.0074；0.0143），表明农村户籍居民在主观福利分化形成的贫困广度以及贫困深度方面更容易烙印相对贫困标签。Aguilar 和 Sumner 曾对 2015 年全球多维贫困状况进行过评估，认为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年轻人最易陷入相对贫困境地[21]3，当下研究揭示的村民在相对贫困广度和深度上的双重相对弱势为此补充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证据。农村弱势群体在相对精神贫困上的标签化倾向表明，农村社会精神生活的相对贫困形势较为严峻，破解农村居民相对精神贫困困局对于提振全社会的主观福祉具有重要的社会意涵。

2. 相对精神贫困锁定人口特征的群分效应

人在不同人生阶段对生活的认知和对幸福的感悟不尽相同，反映出主观福利状态与年龄的关联性。通过年龄组间比较分析发现，老年群体（2.73%；6.44%）出现精神空虚的相对贫困率低于非老年群体（3.28%；7.59%），反映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社会助老机制在增进老年群体主观福利同时，也弱化了其主观福利分化倾向。相对贫困率 t－统计值为 －3.3052（0.0010）和 －3.3851（0.0007），印证了主观福利相对贫困风险在年龄群间差异的显著性，表明区分年龄人群考察相对精神贫困状况是理性的。可喜的是，王小林等对老年群体主观福利与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考察[10]24。当下研究对此提供了来自非老年群体相对精神贫困状态考察结果的补充证据，进一步明确非老年群体在主观福利上的相对贫困忧患不仅表现在贫困广度上，而且其在贫困深度上的忧虑（0.0159；0.0264）也甚于老年群体（0.0127；0.0219），这与 Aguilar 和 Sumner 认为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年轻人更易陷入相对贫困境地的结论相辅相成[21]9。当前研究从中国社会场景的主观福利视角提供了相对贫困易锁定农村非老年群体的证据，共同阐明关注非老年群体相对贫困状况的重要性（见表 2）。从性别角度观察福利分化状态差异向来是学者和公众都关切的人口特征。采用 P_{SW-RP} 测算，农村女性相对贫困发生率（3.34%；7.64%）高于男性（2.83%；6.73%），表明农村女性群体主观福祉缺失的相对贫困发生率甚于男性。不仅如此，女性贫困群体承受的贫困缺口指数（0.0171；0.0277）也甚于男性（0.0124；0.0220），说明女性相对贫困群体承受的贫困深度更为严重，揭示出中国农村社会在主观福祉创造层面的性别不平等。公允评价女性在家庭付出中的社会价值，乃是女性摆脱相对精神贫困的社会基础。农村社会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分布也带有区域异质性。中西部村民相对贫困风险（3.80%；8.74%）高于东部（1.74%；4.78%），区域群间 t 统计值为 －2.9344（0.0034）和 －3.5152（0.0004），证实在双重贫困线下东部与中西部村民面临的相对精神贫困风险具有差别显著，说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也波及到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分布，中西部农村弱势人群更可能附上相对精神贫困标签。但 d＜0.2 显示出一个积极动向，即中西部与东部农村居民面临的相对精神贫困风险的区域差距并不悬殊，存在着趋向收敛的可能。从民族角度考察，汉族相对精神贫困广度（3.70%；8.33%）和深度（0.0226；0.0331）都要比少数民族（3.03%；7.09%）和（0.0141；0.0241）突显，启示民族角度相对贫困治理重心落在汉族内部的福利不平等

① 括号中的前后两个值分别表示 40% 和 50% 相对精神贫困线下的贫困发生率，后续表示也如此。

上。非就业人群相对精神贫困发生率(4.76%;9.52%)和对应缺口指数(0.0228;0.0359)都甚于就业人群(2.03%;5.72%)和0.0097(0.0179),印证了相对精神贫困与就业状况挂钩,未就业者易带有精神福祉困乏的标签。已婚者相对精神贫困发生率(2.52%;6.37%)和贫困缺口指数(0.0122;0.0214)弱于单身群体(5.24%;10.31%)和(0.0244;0.0382),印证了和谐的婚姻是孕育主观福祉而脱离相对精神贫困的现实支撑。人口特征角度的相对贫困考察结果揭示,女性、非老年群体、未就业者、汉族、单身和中西部等农村居民容易被相对精神贫困锁定,印证了 H_{11} 关于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在人口特征上呈现群分效应的推定,为相对精神贫困人口去标签化瞄准了方向。

表2 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锁定人口特征

人口特征	维度	贫困广度		贫困深度		t-统计值 d值	
		贫困发生率	贫困规模	贫困缺口指数	贫困缺口	(40%)	(50%)
性别	男(1307)	2.83%(6.73%)	37(88)	0.0124(0.0220)	16.14(28.72)	-0.7518(0.4522)	-0.8997(0.3684)
	女(1349)	3.34%(7.64%)	45(103)	0.0171(0.0277)	23.05(37.36)	(0.0146)	(0.0175)
区域	东部(921)	1.74%(4.78%)	16(44)	0.0064(0.0134)	5.92(12.34)	-2.9344(0.0034)	-3.5152(0.0004)
	中西部(1735)	3.80%(8.47%)	66(147)	0.0192(0.0310)	33.27(53.74)	(0.0629)	(0.0743)
民族	少数民族(216)	3.03%(7.09%)	74(173)	0.0141(0.0241)	34.31(58.92)	-0.5462(0.5850)	-0.6777(0.4980)
	汉族(2440)	3.70%(8.33%)	8(18)	0.0226(0.0331)	4.88(7.16)	(0.0186)	(0.0233)
就业	就业(1627)	2.03%(5.72%)	33(93)	0.0097(0.0179)	15.73(29.17)	-3.9781(0.0001)	-3.7087(0.0002)
	其他(1029)	4.76%(9.52%)	49(98)	0.0228(0.0359)	23.46(36.91)	(0.0754)	(0.0717)
婚姻	已婚(2103)	2.52%(6.37%)	53(134)	0.0122(0.0214)	25.70(44.98)	-3.3007(0.0010)	-3.1926(0.0014)
	单身(553)	5.24%(10.31%)	29(57)	0.0244(0.0382)	13.49(21.10)	(0.0705)	(0.0711)
年龄	老年(916)	2.73%(6.44%)	25(59)	0.0127(0.0219)	11.60(20.07)	-3.3052(0.0010)	-3.3851(0.0007)
	非老年(1740)	3.28%(7.59%)	57(132)	0.0159(0.0264)	27.59(46.01)	(0.0160)	(0.0224)

注:括号内外数值为按50%和40%相对贫困线测算的结果。

3. 不平等厌恶偏好下相对精神贫困的群间差异表现

不平等厌恶偏好和相对贫困具有从不平等格局衍生而来的同源性,且不平等厌恶偏好制约个体创造福利的竞争动机[15-16],故把不平等厌恶偏好引入相对贫困考察范畴,从中挖掘相对贫困群体脱贫动机内生化路径。鉴于相对贫困难以回避的事实,贫富分化情境容易使人卷入其中,对不平等产生价值判断,并表达解决分配差距的诉求,不平等厌恶偏好由此形成。CGSS2017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社会调查,C2.3为"缩小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政府的责任",选项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共分为五级,反映被调查者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分配偏好。当个体对于缩小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是表示认可时,反映其否定分配差距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将越突显。并且,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归由政府解决的诉求倾向越强,则再度复核了个体不平等厌恶偏好的突显程度。采用C2.3衡量不平等厌恶偏好,契合人们对分配不平等的信念偏好,为从不平等厌恶偏好展开主观福利相对贫困溯源提供了条件。据此,把不平等厌恶偏好持有人群划分为非常厌恶、比较厌恶和偏好模糊等三组。非常厌恶和比较厌恶分别对应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由政府缩小收入差距的偏好持有人群,把不同意或者无法确定等人群归为偏好模糊组,据此考察人们相对精神贫困状况参照不平等厌恶偏好的群间异质性(见表3)。

表3 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在不平等厌恶偏好差异下的表现

不平等厌恶偏好	贫困发生率	贫困缺口指数	贫困缺口	t-统计值
非常厌恶	4.78%(10.30%)	0.0253(0.0391)	16.96(26.22)	-2.9206***(-2.7052***)
比较厌恶	4.12%(6.54%)	0.0195(0.0280)	8.06(11.56)	1.9327~(-0.1600)
偏好模糊	1.56%(4.05%)	0.0092(0.0145)	2.97(4.66)	-0.5071(-2.1175*)

注:括号内外数据各为50%和40%基准的测算结果;显著性水平同表4注。

在所有不平等厌恶偏好类型人群中，对分配不平等“非常厌恶”群体在主观福利上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最高（4.78%；10.30%），表明否定分配差距的不平等厌恶偏好最突显的群体面临主观福祉缺失的相对贫困风险也最高。随着，否定不平等的偏好顺次减弱，村民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发生率也随之下降到偏好模糊组（1.56%；4.05%），从中可窥见不平等厌恶偏好弱化利于主观福利相对贫困消减的趋向。在不平等厌恶偏好群中，非常厌恶和比较厌恶群体占到 70.86%，表明不平等厌恶偏好突显的群体占据人口主流，形成否定分配不平等偏好的压倒性态势，显露出不平等厌恶偏好抑制主观福利提升而导致相对精神贫困风险累积倾向。从贫困群体偏离相对贫困线的程度来看，非常厌恶群体的贫困缺口指数最高（0.0253；0.0391），随着否定差距的不平等厌恶偏好由强转弱，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群体暴露的贫困缺口随之收窄。农村居民在主观福利上的相对贫困广度也是随着不平等厌恶偏好减弱而收窄。因此，不平等厌恶偏好突显抑或弱化是掣肘相对精神贫困状况是否向广度和深度延伸的制约因素，为 H_{12} 提供了证据支持。不平等厌恶偏好群间相对贫困状况差异性考察结果，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分布在不同的不平等厌恶偏好人群中呈现人以群分的异化倾向，丰富了不平等厌恶偏好与相对精神贫困的关系内涵。

四、不平等厌恶偏好制约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的结果分析

（一）分析策略与回归模型设定

探求不平等厌恶偏好对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是本研究的核心任务，其前提条件是要评估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为被解释变量赋值。基于主观福利相对贫困考察结果，分别建立了反映相对精神贫困广度和深度的数据结构，为开启回归分析提供前提条件。接下来，为了揭示不平等厌恶偏好与相对精神贫困关系，设计如下分析策略：首先，控制个体禀赋影响，采用 Logit 和 OLS 并用的回归分析模式，揭示不平等厌恶偏好贡献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的直接效应；其次，采用交互分析法，检验不平等厌恶偏好在相对精神贫困形成过程中的间接贡献。虑及不平等厌恶偏好从客观福利不平等演化而来，建立不平等厌恶偏好与客观福利的交互项，据此揭示不平等厌恶偏好在相对精神贫困演进中的调节效应。本研究采用个体层面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和相对贫困缺口指数反映相对精神贫困状况，根据两类被解释变量的赋值形式，分别采用二值逻辑回归和最小二乘回归。表 4 中前四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被调查者主观福利值与其相对贫困线对比后的相对精神贫困状态值，处于相对贫困线下者赋值为 1，其余为 0。后四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相对精神贫困缺口，以主观福利水平偏离相对贫困线的缺口衡量。后四个模型采用 OLS 分析。前四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采用 Logit 分析。Logit 模型为，

$$y_i^{W_k} = f(x'\beta) + \varepsilon$$

$$p(y_i^{W_k} = j/x) = \begin{cases} \dfrac{exp(x'\beta)}{1 + exp(x'\beta)} j = 1 \ if \ W_k < l_{SW_k - RP} \\ \dfrac{1}{1 + exp(x'\beta)} j = 0 \ if \ W_k \geqslant l_{SW_k - RP} \end{cases}$$

$y_i^{W_k}$—被观察者 i 在 W_k 福利层面与相对贫困基准线 $l_{SW_k - RP}$ 比较确定的状态值，当福利值在相对贫困基准线以下，则 $y_i^{W_k} = 1$，否则为 0。ε 为随机扰动项，x 为人口特征向量。

（二）不平等厌恶偏好扰动村民相对精神贫困状况的直接效应

公平理论论域中的不平等厌恶偏好[13]817，被开创性地引入相对贫困领域，不平等厌恶偏好对相对精神贫困引致效应的揭示，印证了这一理论引入的可行性。逻辑回归系数的联合显著性很高（Prob > chi2 = 0.0000），且 OLS 回归系数的联合显著性也很高（Prob > F = 0.0000）表明，在控制禀赋特征情况下，个体主观福利水平跌落相对贫困线下的可能性和偏离相对贫困线的贫困缺口都可以显著地被不平等厌恶偏好预测。由 Model I 可知，不平等厌恶偏好在 $0.005 < p \leqslant 0.01$ 显著性水

平下,驱动相对精神贫困发生率的贡献系数为0.3295(0.1287),显现不平等厌恶偏好作用于相对贫困的直接效应。当个体由不平等格局衍生否定不平等的负面信念越强时,越可能落入相对精神贫困境地,揭示出不平等厌恶偏好与相对精神贫困广度的同向关联关系,H_{21}获得证实,由此也延伸了Bartling等和Balafoutas等对不平等厌恶偏好与贡献自我福利的竞争行为关系的理论意涵[15-16],即不平等厌恶偏好不仅通过竞争行为制约客观福利水平,而且牵制主观福利分化形成的相对精神贫困。由Model Ⅴ结果所见,不平等厌恶偏好在$p \leqslant 0.005$水平下显著正向驱使贫困缺口伸缩的贡献系数0.0584(0.0124)表明,当个体怀有否定福利分化的不平等厌恶偏好越是强烈时,主观福利演化进路受到分配信念拖拽的阻力越大,主观福利越难以形成,其主观福祉偏离相对贫困线的落差也就越大,H_{22}关于不平等厌恶偏好与相对精神贫困缺口的关系推定获得证实。当社会偏好从公平理论范畴引入到相对贫困论域后,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影响效能从竞争行为扩展到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分布,为将相对精神贫困治理引向干预农村居民不平等厌恶偏好的认知加工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表4 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的回归结果

	Model Ⅰ	Model Ⅱ	Model Ⅲ	Model Ⅳ	Model Ⅴ	Model Ⅵ	Model Ⅶ	Model Ⅷ
	P_{SW-RP}	P_{SW-RP}	P_{SW-RP}	P_{SW-RP}	G_{SW-RP}	G_{SW-RP}	G_{SW-RP}	G_{SW-RP}
偏好	0.3295**	0.2948*	0.3489*	0.3972*	0.0584***	0.0573***	0.0604***	0.0505***
	(0.1287)	(0.1358)	(0.1459)	(0.1987)	(0.0124)	(0.0123)	(0.0123)	(0.0119)
偏好*收入		-8.23e-06~				-3.61e-07~		
		(4.56e-06)				(2.18e-07)		
收入		-6.58e-06				-1.32e-06***		
		(5.24e-06)				(2.51e-07)		
偏好*教育			-0.2402***				-0.0101*	
			(0.0679)				(0.0046)	
教育			-0.0249				-0.0328***	
			(0.0695)				(0.0049)	
偏好*健康				0.0877				-0.0138
				(0.1227)				(.0100)
健康				-1.0038***				-0.1695***
				(0.1217)				(0.0109)
年龄	-0.7545***	-0.7830***	-1.1312***	-1.2907***	-0.1830***	-0.2018***	-0.2444***	-0.2793***
	(0.2634)	(0.2622)	(0.2807)	(0.2768)	(0.0280)	(0.0281)	(0.0293)	(0.0275)
性别	0.0155	-0.0458	-0.1248	-0.0888	-0.0038	-0.0258	-0.0287	-0.0288
	(0.2328)	(0.2358)	(0.2370)	(0.2384)	(0.0250)	(0.0252)	(0.0250)	(0.0239)
就业	0.9982***	0.8990***	0.8874***	0.6387*	0.0634*	0.0467~	0.0466~	0.0064
	(0.2493)	(0.2566)	(0.2503)	(0.2544)	(0.0277)	(0.0278)	(0.0276)	(0.0268)
婚姻	0.6944***	0.6830***	0.8050***	0.8660***	0.1756***	0.1717***	0.1953***	0.1912***
	(0.2454)	(0.2458)	(0.2519)	(0.2566)	(0.0306)	(0.0305)	(0.0306)	(0.0293)
民族	-0.0086	-0.0431	-0.0625	-0.0331	-0.0283	-0.0379	-0.0337	-0.0242
	(0.3880)	(0.3889)	(0.3900)	(0.4011)	(0.0453)	(0.0451)	(0.0449)	(0.0434)
区域	0.8446***	0.7427*	0.6240*	0.3390	0.1702***	0.1384***	0.1271***	0.0923***
	(0.2859)	(0.2940)	(0.2907)	(0.2993)	(0.0261)	(0.0266)	(0.0266)	(0.0254)
准R^2	0.0616	0.0648	0.0842	0.1765				
调整R^2					0.0419	0.0511	0.0583	0.1220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rob > F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显著性水平~—$0.05 < p \leqslant 0.1$,*—$0.01 < p \leqslant 0.05$,**—$0.005 < p \leqslant 0.01$,***—$p \leqslant 0.005$;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值。

不平等厌恶偏好掣肘心理账户的分配，是导致主观福利缺口形成的机制基础。当不平等厌恶偏好尤其是落后厌恶信念出现在分配信念格局时，随着“患不均”的信念突显，原本从点滴获得和些许进步中感知幸福和满足的主观福利创造能力受到抑制，掣肘固有的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演进，加剧精神福祉相对贫困风险。这也是经常抱怨社会分配不平等的人，尤其是落后厌恶信念突显者，很难从已有收获中体验幸福或满足等主观福利的原因所在，负面的不平等信念遮挡了观察生活中幸福满足之源的视线。不平等厌恶偏好根植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乡土文化，直接掣肘乡民主观福利演进，构成其自我拯救地摆脱相对精神贫困的内生动力，这与当下农村社会主观福利演化的现实情境较为契合。在城镇化进程和信息化浪潮不断冲击原本平静的乡村生活背景下，依靠土地耕作获益的收入模式逐渐被农地流转收益、非农就业或创业收入等多元化增收模式取代，农户物质和精神生活出现了分化，不平等厌恶偏好依托的不平等现实环境逐渐形成，制约着村民的主观福利体验，造成主观福利缺口。由此启示，不平等厌恶偏好应从一味否定不平等的消极信念，转向奋斗是消减不平等的根基的积极信念，激励积极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在主观福利形成过程发挥效能，促进乡民在积极的不平等厌恶偏好下收获幸福感和满足感，促进农村居民主观福利提升。

（三）不平等厌恶偏好对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分布的调节效应

不平等厌恶偏好与客观福利交互作用于主观福利分布的结果印证了，村民物质生活上的客观福利改善与精神生活中的主观福利提升不能分割，与 Brethel-Haurwitz 和 Marsh 认为客观福利贡献主观福利的结论相辅相成[8]765。采用交互分析法，探索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偏离客观福利贡献轨迹的发生机理，发现不平等厌恶偏好在其间发挥了调节效应，进一步丰富了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关联关系的内涵。就具体调节路径而言，不平等厌恶偏好与收入交互作用于相对精神贫困发生率的回归系数为 -8.23e-06(4.56e-06)，表明不平等厌恶偏好在收入驱动精神减贫中发挥负性的调节因子作用，削弱了收入对相对精神贫困广度原本的反向贡献效力，增收带动精神减贫的基础作用被弱化，不平等厌恶偏好掣肘相对精神贫困风险的诱导效应被进一步突显。并且，不平等厌恶偏好与收入交互作用于相对贫困缺口指数的回归系数 -3.61e-07(2.18e-07)再次说明，不平等厌恶偏好的介入，也削弱了增收驱动相对精神贫困缺口收窄的贡献倾向。人们经常困惑于金钱为何买不来幸福和满足，抑或财富打拼为何不能让精神生活富足，不平等厌恶偏好基于收入途径对相对精神贫困发挥负向的调节效应，为此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证据。面对不平等格局，乡民增收本应产生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等主观福利，却被其从不平等格局衍生的不公平和愤然于相对落后等负面信念所抑制或消解。不平等厌恶偏好消解了增收对主观福利减贫的贡献力，却推高了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发生风险。不平等厌恶偏好通过教育途径对贫困发生率的调节效应为 -0.2402(0.0679)，且对贫困缺口指数发挥调节效应为 -0.0101(0.0046)，表明不平等厌恶偏好显著弱化了教育原本在主观福利上发挥的减贫效应。因此，通过教育途径引导百姓形成积极的不平等厌恶偏好，促进其与教育形成良性交互作用，推动农村居民主观福祉脱贫。不平等厌恶偏好通过健康途径对精神脱贫发挥正向调节效应 0.0877(0.1227)，表明不平等厌恶偏好的介入，增强了健康贡献相对精神贫困的初始效力。不平等厌恶偏好通过健康途径展现调节效应启示减贫实践，完善医疗健康保障机制，规避因病致贫或因病反贫而造成的主观福利缺失。依据不平等厌恶偏好在收入、教育和健康等途径培育主观福利时发挥调节效应的差异性，应审慎诱导个体在客观福利创造中的不平等信念，相机运用积极的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减贫作用。

五、不平等厌恶偏好对脱离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的启示

当前研究在考察了农户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现状基础上，既揭示了不平等厌恶偏好同向驱动相对精神贫困状况发展的直接效应，又发现了不平等厌恶偏好与收入、教育和健康等客观福利交互作用于相对精神贫困的调节效应，为中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以下启示：

(一)相对贫困线的制定需宽严相济

本研究基于双重贫困线的主观福利相对贫困考察结果说明,随着相对贫困线由宽松转向严苛,相对贫困广度随之扩大,相对贫困缺口也在加深。相对贫困线弹性伸缩引致大规模人群在相对贫困门槛区域挤入挤出的事实昭示,相对贫困线的设定应慎之又慎,需要顺应主观福利动态发展趋向。在党和政府坚持不懈地增进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语境下,社会福利水平必将动态上升。依据相对贫困线的确定基础,实际贫困线也将随之变动。采用宽严相济的双重贫困线,可以为农户福祉改善过程中的相对贫困基准变动预留出调整空间。当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抗击农村社会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将是一场持久战。双重贫困线中的下线可以为贫困治理确立消除绝对贫困再赴减贫征程的近期行动目标,而上线则是实现农村居民充满幸福感和满足感地生活的长期行动目标。

(二)过度否定不平等的分配信念纠偏

不平等厌恶偏好贡献相对精神贫困的直接效应启示,理性利用不平等厌恶偏好的两面性。在农村社会贫富分化逐渐突显背景下,村民心理账户理应分配用于关注已有收获而激发主观福利的部分,却被想得而未得或即使获得也非正义的消极信念挤占,消极分配偏好模式启用,主观福利演进遭到抑制,加剧主观福祉缺失的相对贫困状况恶化。因此,矫正消极分配偏好加工模式是治理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的关键。依据机会平等理论,努力和能力产生的分配不平等符合社会分配正义,是激励人们投入更多努力创造福利的机制基础,也是社会分配机制给予奋斗者的公平回报,为激发民众从奋斗中收获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夯实了社会基础。因此,符合社会正义的分配差距,不应被过度否定,应以分配正义作为分配信念纠偏基准。不平等厌恶偏好助推靶点就落在人们对于社会分配不平等公平与否的心理账户分配上,纠正偏激的不公平认知引致过度否定不平等的信念偏差,启发百姓构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且分配不平等是个人努力差异结果的理性信念格局。并且,为消减不能"赶上琼斯"的焦虑对不平等信念造成的偏差,政策着力点应落在推动社会分配机制公平化上。伴随着社会分配体制治理的不断进步,激发民众树立对社会分配越来越公平的信心,推动百姓在不平等格局下启用积极的分配信念加工模式。强化心理账户向关注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不平等倾斜,而淡化违逆社会分配正义的不平等对分配偏好形成的干扰,形成积极不平等厌恶偏好对符合正义的福利分布结果的良性驱动,筑牢农村社会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不断提升的社会基础。

(三)视交互途径相机抉择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引导途径

鉴于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主观福利与客观福利不能截然分割,需要根据不平等厌恶偏好在客观福利驱动主观福利形成中发挥调节效应的差异性,相机引导福利分化厌恶偏好取向。针对不平等厌恶偏好在收入途径下作为负向调节因子的角色,应依托收入格局诱导不平等厌恶偏好的认知模式,突显积极的不平等厌恶偏好与收入在主观福利形成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增收是实现农户物质生活脱贫的基础,但当收入水平超出保障物质生活质量的功能范畴时,其对主观福利贡献能力即被不平等厌恶偏好削弱,就不能一味地依赖收入增长,而应发挥不平等厌恶偏好对主观福利的诱导效应。引导新时代的村民启用积极的不平等信念模式,建立依靠奋斗消减不平等的信念格局,从奋斗中增进幸福感和满足感等主观福祉,助力脱离相对精神贫困。不平等厌恶偏好通过教育途径发挥正向调节因子的作用表明,教育对主观福利的原有贡献被不平等厌恶偏好进一步强化,精神减贫更要依靠教育。根据教育贡献福利创造的直接效应,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化,不仅要解决教育资源分配区域失衡问题,更要破解相对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和劳动力就业培训等隐性教育失衡问题。不仅如此,应根据不平等厌恶偏好在教育途径发挥的调节效应,通过教育改善人们不平等厌恶偏好的信念加工模式,根据社会分配不平等的时局变化更加理性地进行分配信念加工,建立起积极的不平等厌恶偏好,良性驱动百姓幸福感、满足感和获得感等主观福利体验不断显化。

根据不平等厌恶偏好与健康的正向交互效应，引导人们淡化一时的物质得失，降低患得患失对身心健康的不利影响，关注重点放在主观福利提升上。通过积极的不平等厌恶偏好诱导，强化健康身体以及豁达心境对主观福利的基础性作用，增加精神脱贫的可能性。

（四）社会机制配合推动相对贫困群体去标签化

依据村民主观福利相对贫困对个体禀赋和身份特征的锁定效应，启示主观福利减贫工作重心之一是贫困人口去标签化。鉴于相对精神贫困发生率的年龄标签，若要破除农村非老年群体安于现状或重在物质享乐等精神福祉匮乏症结，重在提振新一代村民的奋斗精神，缓解消极的不平等信念倾向，引导建立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信念。依据相对精神贫困更易于锁定女性弱势群体，在扩大女性就业机会同时，对于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努力给予公允估值，尤其对于女性在孕育抚养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方面的巨大付出，社会福利机制适度补偿其正向外溢效应，对于缓解农村女性相对精神贫困和由众多家庭构成的庞大社会的永续发展意义深远。民族与相对精神贫困的正关联提示，相对贫困治理重心需要适时调整。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偏远连片贫困农村地区少数民族贫困群体是帮扶重点。当下，农村汉族群众主观福利相对贫困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减贫中心。虑及相对精神贫困锁定中西部农村弱势群体，经济发展吸引中西部人口向东迁移，符合相对贫困对区域的回归分析逻辑，但与消减中西部贫困群众相对贫困形成悖论。从根本上看，继续贯彻东部对口帮扶中西部的区域不平衡治理举措，益于促进中西部人口特征与相对贫困脱钩。

在党和政府努力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社会背景下，本研究开启了主观福利视角的相对贫困考察模式，揭示了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相对贫困状况的群分效应，为补齐农村弱势群体主观福利短板瞄准了方向。不平等厌恶偏好作为直接驱动因子和间接调节因子的发现，突破了倚重外部帮扶的减贫定式，为农户脱离相对精神贫困找到了自我拯救路径。

参考文献：

[1]GALBRAITH J, The affluent society[M].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58.

[2]FUCHS V R. Redefining Poverty and Redistributing Income[J]. The Public Interest, 1967,14(8):88 - 95.

[3]李实,李玉青,李庆海.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演化[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30 - 42 + 189.

[4]DECERF B. Combining absolute and relative poverty: income poverty measurement with two poverty lines[J].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20(8):1 - 38.

[5]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Attacking poverty[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SEN A.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a

[7]KAHNEMAN D, DIENER E, SCHWARZ N.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M]. New York,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3.

[8]BRETHEL-HAURWITZ K M, MARSH A A.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predict extraordinary altruism[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5(3): 762 - 771.

[9]ALKIRE S. The missing dimensions of poverty data: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7, 35(4):347 - 359.

[10]王小林, 尚晓援, 徐丽萍. 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态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12(4):22 - 28.

[11]ASADULLAH M N, CHAUDHURY 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Bangladesh[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12, 33(5):940 - 950.

[12]张莎莎,郑循刚. 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内生动力[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4 - 53.

[13]FEHR E, SCHMIDT K.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114(3):817 - 68.

[14]FEHR E, BERNHARD H, ROCKENBACH B. Egalitarianism in young children[J]. Nature, 2008, 454(8):1079 - 1084.

[15]BARTLING B, FEHR E, MARECHAL M A, et al. Egalitarianism and competitivenes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2009, 99(2):93 - 98.
[16]BALAFOUTAS B, KERSCHBAMER R, SUTTER M. Distributional preferences and competitive behavior[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 2012,83(1):125 - 135.
[17]DIENER E. New find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2, 67(8): 590 - 597.
[18]ALKIRE S,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7):476 - 487.
[19]周力. 相对贫困标准划定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14):70 - 79.
[20]汪三贵,孙俊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标准、测量与瞄准——基于2018年中国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21(3):2 - 23.
[21]AGUILAR G R, SUMNER A. Who is the world's poor? A new profile of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J]. World Development, 2020, 126:1 - 15.

Inequality Aversion and Rural Residents' Relative Povert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HUANG Yan-min, LI Chun-xiao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ocial preference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RPSW), and inequality aversion is regarded as the endogenous impetus to escape the relative poverty. Based on CGSS2017 date, calculate poverty incidence and poverty gap index, to analyze RPSW. Logit is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breadth of relative poverty. We found that inequality aversion may directly contribute to RPSW, and moderate the RPSW by the way of the objective well-being, including income, education and health status. Inequality aversion preference departure from poverty gap index with positive contribution, and regulate with income, education and health status. Therefore, it's the key endogenous path for the reduction of RPSW that the positive belief of inequality aversion should be nudged when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have been improving.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s; relative poverty; subjective well-being; inequality aversion